



## 美国的对手与非常规战争的兴起

塞斯·琼斯<sup>1</sup>

编者按：近日，有美国智库专家指出，非常规战争正在成为大国竞争的最新舞台，建议拜登政府在信息战、网络战、对政府和非政府伙伴的支持、秘密行动和经济强制等方面投入更多资源，包括像冷战时期研究苏联那样深入研究中国、俄罗斯等伊朗等对手。

常规战争在很大程度上定义了 20 世纪的大国冲突，非常规战争（irregular warfare）则很可能塑造未来的国际政治。由于常规战争和核战争代价高昂，中国、俄罗斯和伊朗等国家将使用非常规手段同美国竞争。非常规战争使用的武器并非战略轰炸机、坦克或步兵，而是黑客、情报人员、特种作战部队和潜藏于阴影下的私营军工集团。

不幸的是，美国为此类竞争所做的准备严重不足。美国政府过度关注常规战争和核战争，包括为波罗的海国家、台湾海峡以及南中国海可能发生的核战争以及常规战争做准备。然而，中国、俄罗斯和伊朗每天都在用非常规手段对抗美国。最新的例子包括俄罗斯联邦对外情报局针对多达 250 家美国政府机构与公司发动的大规模网络攻击。

---

<sup>1</sup> 塞斯·琼斯（Seth G. Jones）是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的高级副总裁、国际安全计划和跨国威胁项目主任。本文英文原文发表于英文网站：<https://www.csis.org/analysis/future-competition-us-adversaries-and-growth-irregular-warfare>，此为中文摘译版。

实际上，美国无需在常规、核以及非常规竞争中做取舍，这些竞争方式都至关重要。俄罗斯和中国正在发展能对美国及其盟友构成威胁的常规和核军事能力。对拜登政府而言，最大的挑战将是在常规、核以及非常规战争的准备和威慑中找到平衡。

### 从克劳塞维茨到孙子

非常规战争指的是不需动用常规战争和核战争的活动，旨在扩大一国的影响力和合法性，并削弱其对手。正如美国国防部2020年的一份文件指出的，非常规战争“有利于各国采取间接和非对称的手段”，以“削弱对手的力量、影响和意志”。这包含众多政府可以用来改变权力对比的治国手段，如信息战（包括心理战和政治宣传等）、网络战、对政府和非政府伙伴的支持、秘密行动、间谍行动和经济强制等。

非常规战争中的许多工具，如信息战和网络战，可同时用于非常规战争和常规战争。在非常规战争中，一国可以将这些手段作为权力竞争的杠杆，设计并使用它们来削弱对手，而不需进行真枪实弹的对抗。一些政府官员和学者也使用其他术语来描述非常规战争中部分或全部的活动，如政治战、混合战、灰色地带活动、不对称冲突或间接手段等。

非常规战争和常规战争有显著不同，后者也被称为“传统”或“正规”战争，指直接使用海陆空以及其他军事能力，在战场上打败敌人的武装力量，谋求控制领土、人口和兵力，或彻底摧毁敌军的作战能力。非常规战争也同核战争不同，后者指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以对抗敌人。非常规战争还和日常对外政策不同，对外政策包括传统外交、人道主义援助、情报活动，以及其他对抗性不强的活动。

部分人士可能反对使用“战争”一词来描述包括经济强制和信息战在内的非暴力行动，但美国的对手们并不这样认为。他们对战争有更广泛的界定，认为战争是“竞争实体之间的对抗”。中国使用了诸如“三种战法”的术语，即媒体战、心理战和法律战，这些方面都不涉及直接使用暴力。伊朗提出了“软战争”等术语，通过运用政治宣传和传播假消息等手段来影响他国。俄罗斯几十年来一直把“积极措施”作为对抗美国及其盟友的战争工具。美国军事历史学家查尔斯·巴

特尔斯（Charles Bartles）曾写道：“虽然西方认为这些非军事手段是避免战争的方式，而俄罗斯却把这些措施视作战争。”

总而言之，拜登政府所面临的未来战争观，与普鲁士军事理论家卡尔·冯·克劳塞维茨相比，更接近于中国的军事战略家孙子。前者认为战争仅仅是“迫使对手实现我们意志的暴力行为”，这种定义已经过于狭隘。

### 积极措施与三种战术

非常规战争并非新鲜事物。冷战期间，包括克格勃在内的苏联情报组织在世界各地开展针对美国的进攻性非常规战争。克格勃前外国反情报部门负责人奥列格·卡卢金（Oleg Kalugin）将“积极措施”以及类似的行动形容为“苏联情报活动的核心与灵魂”，这些行动被用来“削弱美国”和“在西方的各种社区组织中嵌入楔子”。

拜登政府上台之时，美国的对手们也在使用非常规战略和战术。最典型的例子是俄罗斯。在总统普京、总参谋长瓦列里·格拉西莫夫（Valery Gerasimov）以及其他官员的指挥下，俄罗斯综合运用了网络攻击、间谍活动、秘密行动以及信息和假消息战等进攻性手段来削弱美国，扩大自身影响力。俄罗斯插手了美国大选，并在美国境内传播假消息，试图利用“黑人的生命也是命”运动（Black Lives Matter）、Me Too 运动、新冠肺炎疫情、枪支管控、白人至上主义、堕胎问题和移民问题来煽动社会、种族和政治不和。俄罗斯也在美国的重要基础设施中植入了恶意软件，包括 Triton 和 BlackEnergy，对美国本土的发电厂、电网、通讯网络和金融系统构成威胁。俄罗斯机构还使用影子组织开展信息战和网络攻击，包括互联网研究组织（IRA）、卡巴斯基实验室（Kaspersky Lab）、网络或网络黑客（如“Cozy Bear”、“Fancy Bear”、“Guccifer 2.0”）以及私营军工集团（如瓦格纳集团）。

在海外，俄罗斯试图削弱美国并破坏美国与其盟友的关系。俄罗斯情报机构不断传播假消息，诬陷美国支持“伊斯兰国”和位于叙利亚、阿富汗等国的其他恐怖组织。俄罗斯还和包括黎巴嫩真主党在内的恐怖组织以及位于乌克兰、叙利亚、利比亚和阿富汗的非政府组织合作，并为欧洲的部分政治领袖提供支持，包

括一些极右组织（如意大利的北方联盟党、奥地利的自由党等），试图在美国与其欧洲盟友间制造分歧。

伊朗同样奉行非常规战争，拥有由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军领导的强大的非常规军事力量。针对伊朗，拜登政府的最大挑战可能并非重启伊核协议谈判，而是削弱伊朗在该地区的非常规战争活动及其对包括黎巴嫩真主党在内的非国家行为体的支持。圣城军向位于叙利亚、伊拉克、也门、黎巴嫩、阿富汗以及其他国家的非国家力量提供援助。此外，在俄罗斯、中国和朝鲜的支持下，伊朗拥有中东地区最大的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力量。伊朗还增强了进攻性网络攻击能力，主要目标为美国的赌场、水坝、电网以及金融机构（如美国银行、摩根大通和纽约证券交易所）。

最后，为了实现一系列国家目标，中国也开展了非常规活动。这些目标包括：扩大本国（尤其是在亚洲的）的影响力，增强经济实力，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技术、军事和经济强国。通过中国人民解放军61398部队等机构，中国已成为美国竞争对手中拥有最先进网络能力的国家之一。通过全球发展战略，如“一带一路”倡议，中国不断扩大自己在全球的经济、政治、军事和科技领域的影响力。中国还通过通信巨头华为以及其他技术公司在全球范围内推广5G技术。此外，中国还动用了渔船船队，在岛礁上建造人工岛屿，维护在太平洋的领土和资源主张。

中国的影响甚至触及美国本土。例如，中国影响了好莱坞，时常要求美国制片商修改电影内容。好莱坞电影中很少有中国反派，这和冷战时的情形相差甚远。一项研究表明，为确保电影能顺利进入中国市场，“自我审查”机制已在好莱坞流行。

美国还有时间来改变这些进程，但这需要美国大幅改变思维方式和竞争手段。

### 非常规竞争

非常规战争是大国竞争的最新舞台。做好这项工作需要更好地理解当下竞争的本质，实施符合美国价值观的战略和政策。竞争并不意味着坏事，竞争也并不妨碍合作。即使在冷战最为激烈的时期，美国和苏联也仍然在军备控制等双方具

有共同利益的领域实现了合作。在未来，中国仍将是美国重要的贸易合作伙伴，也是美国企业的关键海外市场。中国的经济体量正在迅速增长，其制造业稳居世界第一，14亿人口对美国公司来说极具吸引力。中国更拥有4亿人的千禧一代，这一数字是美国的五倍。

在国际政治中，当今的竞争很大程度上是对立的政治、经济以及军事体制之间的斗争。拜登政府最重要的一项工作是根据美国一贯的核心原则重构美国外交政策。下一步应当是更好地理解中国、俄罗斯和伊朗对同美国竞争的看法。可惜的是，美国没有从历史中吸取教训。例如，中国在翻译和研究美国文化和政治方面投入了大量资源。而与冷战时期不同的是，美国政府和私营企业未能充分对语言能力和专业技能进行投资，因而难以和中国有效竞争。美国国家安全文件提出，中国和美国正在进行长期的战略竞争。但当审视美国媒体和普遍缺乏政府资金支持的汉语项目时，美国对中国了解的缺失，使人们很难真正意识到这一点。

美国应对上述挑战的选择之一是在国会的支持下建立符合二十一世纪标准的开源信息服务体系。美国应当从翻译中国、俄罗斯和伊朗等主要竞争对手的资料开始，并且应当把这些材料公之于众。例如，中国国家领导人的每一次讲话都应在一到两天内被翻译成英文并公开。机器学习技术和谷歌翻译等技术可以作为暂时的手段，但它们不能完全替代人工翻译，因为其无法体现由地方文化、政治和历史带来的语言上的微妙差异。此外，美国还应增加资源投入，帮助其外交官、士兵以及间谍学习中国、俄罗斯和波斯的语言、历史、政治和文化。乔治·凯南在“长电报”中曾敦促美国人研究苏联，从而真正理解“我们正在经历的运动（指冷战）的实质”。最后，拜登政府需要在包括信息等领域中，针对中国、俄罗斯以及伊朗开展进攻性而非仅仅是防御性的行动，并同在欧洲、亚洲以及其他地区的盟友合作。

但是，美国在海外能够做和应该做的事情是有限度的，使用军事手段应尤为慎重。美国外交政策的目标不应是所谓的“自由主义霸权”，即试图通过政权更迭和军事干预，将自由主义价值观强加于外国人民之上，并建立所谓的自由民主制度。美国确有责任鼓励自由贸易、民主、人权和其他核心价值观，但一般情况下不应诉诸武力。

美国对民主、宗教自由和自由市场的信仰对于自身的国家建构至关重要，它们在同苏联对抗以及最终赢得冷战的过程中也发挥了关键作用。当下，它们对美国赢得同对手的竞争也将起到重大作用。

（陈泽均摘译，归泳涛校）